

# 话语互动——批评话语研究新课题的多维思考\*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摘要:** 批评话语研究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新发展体现在其新的研究课题上面。“话语互动”便是这样一个新课题。进入 21 世纪,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取代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社会问题,成为批评话语研究的新焦点,同时也催生出可以引发更多理论思考的“话语互动”新课题。本文对“话语互动”的概念进行界定,讨论其批评话语研究的学科基础及其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传统,分析“话语互动”与“符号互动”“言语互动”等概念的异同,借此阐释话语互动研究在 21 世纪前 20 年已经显示出的批评话语研究理论发展潜势。

**关键词:** 批评话语研究; 新课题; 话语互动; 符号互动; 言语互动

DOI:10.13458/j.cnki.flatt.004771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21)03-0013-10

## 1.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进入批评话语研究的新阶段(田海龙,2016),直面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问题,其理论关注也进一步聚焦社会活动各领域和层级之间体现在话语层面的彼此联系和相互制约特征。对批评话语研究新阶段关注的新课题进行思考,田海龙(2017)将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实践的分析研究扩展到社会实践网络,倡议关注社会实践网络中各社会实践之间相互作用的“话语互动”问题,并对中医话语与西医话语之间的横向话语互动(田海龙,2020)以及社会结构中权威话语的纵向话语互动(Tian,2020)进行案例研究,提出一个包括“三维-双向”分析模型和“双层-五步”分析框架的批评话语研究“话语互动”新路径(田海龙,2021)。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界定“话语互动”概念的基础上,从多学科的角度讨论“话语互动”研究的学科基础和理论渊源,并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思考“话语互动”这一新课题对批评话语研究新发展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2. “话语互动”概念的界定

“话语互动”的概念表明话语与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批评话语研究领域,“话语”代表一种社会实践,其中语言使用的形式(如文本和语体)和与语言使用相关的社会因素(如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机构、身份)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基于此,“话语互动”的概念指社会实践网络中不同活动领域中的社会主体彼此之间通过语言使用形成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田海龙,2020)。如果说“话语”的概念凸显“批评话语分析”注重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即话语的社会功能,见田海龙,2012),强调话语的社会实践(Fairclough & Wodak,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评话语分析学派及分支理论方法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TJWW17-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田海龙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批评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作者邮箱: tianhl@tjfsu.edu.cn

1997/2012) 属性, 将话语作为社会活动( Jones & Norris 2005; Krippendorff 2020) 进行研究, 那么, “话语互动”的概念则是“批评话语研究”将研究对象扩展至社会生活中话语与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上面, 强调社会主体通过使用一定的语言形式实现社会互动。在这个意义上, “话语互动”并非简单地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联系, 也不是静态地表明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互语”关系; 相反, “话语互动”的概念强调社会主体通过使用特定的语言形式对其他社会主体产生影响并造成后果。因此, 围绕“话语活动”这一新课题的研究更加关注社会活动主体之间借助语言形式实现的社会互动, 更加注重对话语互动机制进行理论阐释, 并借此实现批评话语研究新阶段设定的理论建构目标。

### 3. “话语互动”的学科基础

“话语互动”作为批评话语研究的新课题, 有着深厚的批评话语研究学科基础。费尔克劳和沃达克( Fairclough & Wodak, 1997/2012) 曾明确指出,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即是具有语言形式的社会互动的实际案例。而且, 许多批评话语研究的案例研究对“话语互动”都有所涉及。例如, 费尔克劳运用“辩证-关系”的研究路径( Fairclough 2009) 对话语变化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在探究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体现在关于这些主体的各种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上面。Fairclough( 2006) 认为, 全球化是一个实际发生在国际层级、国家层级、地区层级、甚至城市和乡村层级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变化, 其中任何一个变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与其他变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彼此形成一个体系, 使得全球化成为处于“层级网络”中的各个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他进一步指出, 全球化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 也是语言运用的全球化, 其中一种话语和( 或) 语体对另一种话语和( 或) 语体产生影响, 并使其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 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社会变革, 是各种社会要素之间关系的变化, 这种关系的变化也包括处于一个社会活动领域里的社会主体所固有的话语和( 或) 语体与处于另一个社会领域里的社会主体所固有的话语和( 或) 语体之间关系的变化( Fairclough 2006: 10)。

除此之外, 沃达克运用“话语-历史”路径( Wodak 2001/2012) 分析“奥地利优先”请愿书中的种族歧视问题时, 也涉及“话语互动”问题。她认为, 话语涉及的主题使得话语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以文本和语体的形式出现, 同时又通过相同的主题将这些活动领域以及文本和语体联系起来, 进而建立起话语与话语的联系。基于此, 她在案例研究中不仅分析奥地利自由党的“奥地利优先”话语与内务部长的“国家安全”话语之间的联系, 还分析这个请愿书文本与内政部长所做的安全报告文本之间的联系, 这种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互语”关系以及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不仅通过一些共同主题( 如外国人犯罪、增强执法权力、非法移民、驱逐犯罪的外国人, 等等) 建立起来, 而且这些通过主题建立起来的互语关系和互文关系还因为语体的不同( 如奥地利优先请愿书是请愿语体、安全报告是部长报告语体) 与不同的“活动领域”联系起来, 进而使这些不同的活动领域( 请愿书属于政治执行和行政活动领域、安全报告属于公众意见形成的活动领域) 通过这种互语关系和互文关系联系起来, 构成一个包含这些活动领域的“政治活动领域”( 见 Wodak, 2001/

2012: 243 - 246)。

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注意到社会互动中的“话语互动”问题,为批评话语研究阶段深入关于“话语互动”的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但是在具体的研究案例中却没有在理论上阐释话语互动造成后果的机制,更没有在具体的分析框架上体现分析“话语互动”的具体方法。例如,沃达克对“奥地利优先”话语的分析虽然明确地将该话语与其他话语(如国家安全话语)之间的联系凸显出来,但是“话语-历史”研究路径除了观察不同话语、不同文本、不同语体在共同的“主题”上具有联系之外,并没有提供其他可供分析的维度。在这方面,正如田海龙(2021)指出的那样,对“话语互动”进行深入研究,也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新发展。

#### 4. “话语互动”的研究传统

尽管“话语互动”这一概念体现着批评话语研究在新阶段凸显的新课题及其引发的理论发展潜势,但是它并非是一个空穴来风、没有根基的新奇概念。它所代表的一些思想内容在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传统中均有所涉及。

##### 4.1 社会学研究传统

“话语互动”在社会学领域体现在关于“符号互动”的学说上面。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00 - 1987)在其老师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 - 1931)关于自我、心灵和社会的论述基础上提出“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也称“象征互动论”。这里的“互动”主要指人类群体生活中活动与活动、行为与行为、动作与动作之间的相互作用。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生活中人与人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是以“互动”的形式体现的。一个活动作用于另一个活动,或者一个活动回应前一个活动,其“互动”方式在符号互动论看来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两个活动之间有一个媒介过程。布鲁默(Blumer, 1969: 8)以两个拳击手的互动来说明这个问题:当一个拳击手挥拳击向另一个拳击手的时候,后一个拳击手下意识地抬臂阻挡,这个动作就不属于符号互动。只有当他经过思考判断出对手的动作是真还是假之后采取应对动作时,这时才发生符号互动。因此,符号互动是一个经过人这一社会主体能动地解释和判断之后对前一个活动采取相应活动的过程。这种关于“互动”的阐释,体现出人的能动性和互动的社会性。所谓人的能动性,布鲁默认为其源头是米德提出的“自我”概念,即拥有自我,这意味着人不仅可以与别的客体互动,也可以将自己作为互动的客体并与自己互动;而互动的社会性则体现为互动是一个交际的形式,人可以谈论自己并可回应自己,通过这种“自我互动”人可以不断地认识自身对于自己的意义,并利用这种认识来引导自己的行动和确立自己和周边环境的关系(Blumer, 1969: 12 - 15)。

“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的能动性导致了行动与行动之间相互作用的间接性特征,而这种间接性与符号密切相关,体现出“符号”在“符号互动”概念中的内涵。在符号互动论看来,“符号”可以是语言、文字、记号,也可以是个体的动作和姿势;符号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符号具有意义。例如,拳击手的一个动作可以是进攻性的击打,也可以是虚晃一拳,就是这个动作作为符号所具有的“意义”。相对于语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言,动作的意义更

是符号互动论的关注重点。在这方面,动作的意义被认为不是事先确定的,也不是具有意义的动作自动散发出来的,更不是通过人所具有的心智成分聚集而成;相反,动作的意义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对相关动作的解释和判断生成的(Blumer, 1969: 4)。就拳击手动作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抬手出击的意义并不总是意味着出击;抬手出击这个动作是实拳还是虚拳,只有身处现场与这个拳击手互动的另一个拳击手才能辨别,他解释判断这个动作的意义、并据此采取下一个动作的过程构成了符号互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关于“符号互动”的认识与批评话语研究关于“话语互动”认识颇为相似。

#### 4.2 社会语言学研究传统

“话语互动”在社会语言学的交际民族志研究传统中被视为“言语交际”,是“一种具有文化特征、基于语言运用的交际活动”(Coupland & Jaworski, 2009: 576)。这种发生在特定环境中的交际活动(或称“言语事件”),可以是“教堂里做礼拜、拍卖行里做交易、教室里上课、酒会上交谈”,等等(祝晔瑾, 2013: 166)。一个言语事件可以是一个言语行为,也可以由多个言语行为构成,海姆斯(Hymes, 1986/2009)认为,研究一个完整的言语事件,应该观察8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场所和场景、参与者、目的、行为序列、基调、媒介、交往规范和解释规范、交际类型。这8个方面的英文第一个字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英文单词: SPEAKING, 形成海姆斯提出的描写言语事件的框架,并可进一步细分为16个方面的内容(见Hymes, 1986/2009: 589-596)。“言语事件”的概念之所以与“话语互动”相关联,是因为海姆斯强调交际过程中的“文化意义在互动中被创造出来并保持下去”(Coupland & Jaworski, 2009: 577)。正是基于海姆斯的这一思想,甘柏兹(Gumperz)的“互动社会语言学”最终将“交际”的概念化作“互动”,体现出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与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社会这两个研究路线在“社会活动”上的交汇。对此,卡博兰德和吉沃斯基(Coupland & Jaworski, 2009)曾指出,一方面,社会语言学对言语运用的研究不断加深,逐渐认识到语言运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在人际交际中的重要,因此也赋予言语以“社会活动”的性质;另一方面,社会语言学对社会范畴的研究,如对身份如何在语言运用中产生的研究,也凸显了社会语言学对“社会活动”的关注。可见,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社会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将“交际”的含义从单纯的意义传递发展为交际双方之间的“互动”。

不仅如此,甘柏兹的互动社会语言学还对会话参与者如何实现互动做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解释。Gumperz(1982/2009: 598)认为,在会话交际的过程中,说话的一方需要对另一方给出的“情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s)不断地做出判断,以决定自己下一步需要做出什么言语反应;而听的一方也要运用一些会话策略(如会话推断)来理解对方给出的语言信息,进而推断讲话人在采取某个言语行为时所遵循的语境规约,并检验相关的语言信号获得怎样的理解,了解交际是否成功,如果不成功,要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调整,等等。这里,“情境化提示”是甘柏兹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情境化提示可以是会话交际过程中出现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也可以是会话过程中出现的具有边缘语言特征的表现形式,如音高、节律、非音位性发音特征、程式化表达,等等。情境化提示作为会话策略凸显了言语交际中会话双方彼此互动的特征,表明会话的顺利推进不是依赖于事先认可的社会范



畴,而是取决于会话双方对交际内容进行协商这一互动过程。

### 5. “话语互动”新课题的特征

以上讨论表明,“话语互动”在批评话语研究领域具有学科基础,同时在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具有研究传统。然而,“话语互动”作为批评话语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其特征并非是这些研究传统具有的共同点,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

#### 5.1 “话语互动”与“话语”的区别

作为批评话语研究新阶段的新课题,“话语互动”与批评话语研究之前的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话语”有着明显的区别。“话语”体现出语言使用和与语言使用相关的社会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种社会实践;而“话语互动”则体现一个话语与另一个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田海龙(2020)用图1和图2描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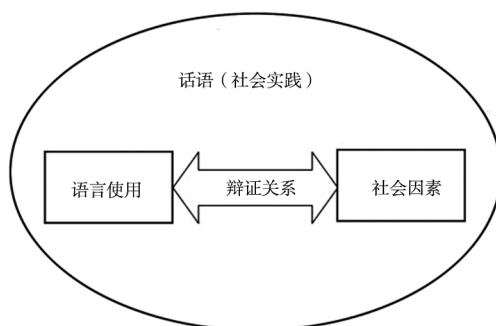


图1 “话语”的概念 (田海龙 2020: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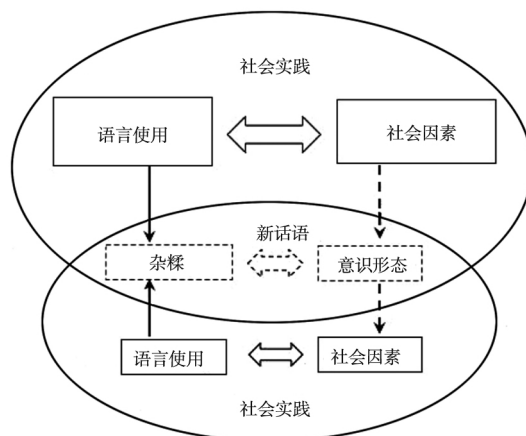


图2 “话语互动”的概念 (田海龙 2020: 130)

认识“话语互动”与“话语”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是认识批评话语分析进入到批评话语研究新阶段的基础。与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种族歧视等社会不平等问题不同,批评话语研究更多的关注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新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后英雄”社会的兴起及对过去历史具有区别性的建构、公共及其他领域话语愈加断裂和碎片化、技术的作用在社会中广为渗透并对话语施加影响、民主在形式上稳定的民主体制里坍塌、以及最近随着作为后现代社会主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发展而出

现的金融、经济和移民危机,等等(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 256)。面对这些新的社会问题,批评话语研究需要新的理论和概念,正如费尔克劳(2019)所说,“现在是‘新时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目前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议题,必要时甚至需要加以修改。”因此,克瑞兹诺斯基和福特纳(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提出批评话语研究要“以语境为导向”,注重“与活动者相关”的分析。在这方面,研究社会主体及其话语在各个活动领域之间的互动交往,分析由此产生的相互影响及其带来的后果,就需要一个新的概念加以体现。“话语互动”的概念无疑较“话语”概念更能体现这一新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倾向,因为“话语互动”凸显话语与话语的“互动”,而“话语”仅体现话语是一个独立的“活动”。与“话语”的概念相比,“话语互动”的概念更加“凸显话语的社会互动特征。如果说“话语”的概念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重点,那么,“话语互动”则是批评话语研究关注的新研究课题,它代表着与“原始的”“传统的”“基础的”“核心的”“以语言运用为导向的”批评话语分析的区别,体现着批评话语研究“新的”“更宽广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理论发展目标。随着批评话语分析发展到批评话语研究的新阶段,“话语互动”也将替代“话语”成为批评话语研究的新课题。

### 5.2 “话语互动”与“符号互动”的区别

符号互动论有两个主要观点,即:1) 互动是一个间接的过程,2) 动作的意义通过人的解释和判断生成。根据布鲁默(Blumer, 1969: 2-6)的阐释,符号互动论的这些观点基于三个前提:1) 人作用于其他事物(不论是物质世界中的物体,还是人类社会的其他类别,抑或是学校这样的机构、诚实这样的思想、命令这样的动作)的基础是这些事物具有的意义;2) 这些事物具有的意义产生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3) 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被处理和修订,这个过程亦是人处理他所遇事物的过程。符号互动论的这些观点和前提与“话语互动”的概念相向而行。例如,第三个前提明白无误地表明,人解释和判断某一动作对其具有哪种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形成作用的过程:人在这个解释过程中并不是仅仅对动作已具有的意义进行唤醒和应用,而是要将动作已具有的意义与自身联系起来,要与自己互动;同时,与自己互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动作所具有的意义进行不同形式的处理,如依据自己所处的情景对动作所具有的意义进行相应的选择、悬置、重组、转形。这样的一个解释和判断过程,其意义在符号互动论看来不是各种心理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直接后果,也不是已有意义自动生成的结果,而是对互动过程中的动作所具有的意义进行处理,进而构成指导和形成下一个动作的前提和基础。

可以认为,符号互动论对互动的间接性、互动结果因人而异的不确定性的阐释,以及关于人对互动意义的主观判断可以指导、形成和阐释后续动作,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话语互动”概念的含义。然而,布鲁默关于“符号互动”的阐释也与“话语互动”概念有两个不同之处。首先,符号互动论的研究重点是活动与活动之间的互动,并没有涉及话语互动研究所关注的语言运用。尽管符号互动论引入意义的概念,但是,它关于意义的论述,包括关于符号的论述,都在试图说明互动所具有的间接性特征,而这种间接性的本质则是米德(Mead, 1934)关于自我的经典阐述。在这个意义上,符号互动论更是一种哲学的理论视

角,或者如布鲁默(Blumer,1969:21)所言,是一种经验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与此相对,“话语互动”研究的是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互动。诚然,话语包括语言使用和与语言使用相关的社会因素(田海龙,2009;2020),因此话语被认为是社会实践(Fairclough & Wodak,1997/2012),是活动(Jones & Norris,2005;Krippendorff,2020),但是,如果说“符号互动”倾向于关注社会主体如何通过“活动”实现社会互动,那么“话语互动”则倾向于关注社会主体如何通过使用语言实现社会互动。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互动”研究有着具体的观察对象,如社会主体具体使用的文本或语体,因此也是基于话语分析案例研究的批评话语研究,而不像符号互动论那样只是一种哲学或经验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

其次,符号互动论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与话语互动研究有所区别。毋庸置疑,符号互动论在布鲁默看来是一个接地气的研究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活动的科学方法(Blumer,1969:21),而且,他关于方法论的见解也很适用于话语互动研究。例如,Blumer(1969:24)认为,经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应该等同于先进的量化研究步骤,不应该通过复杂的数理统计和数学计算建立起变量之间的联系,而应该是包括程序步骤和前提在内的整个研究活动,如:1)拥有并运用一个事先描绘的经验世界的图景框架;2)了解关于这个经验世界有哪些疑问并将这些疑问转化为研究问题;3)确定收集的数据以及收集这些数据的方法;4)确定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5)解释研究发现;6)使用相关概念。然而,观察一些应用符号互动论方法的案例研究(如冯玉波、冷明祥,2014),符号互动论并没有将语言符号的具体运用方式和策略作为研究“互动”的观察重点,也没有提供一个可操作的话语分析框架。与此不同,批评话语研究在观察“话语互动”的过程中,始终将语言运用作为观察的重点,借助语言运用这一窗口探究社会主体之间互动的机制。例如,田海龙(2020)提出一个分析中西医话语互动的“双层-五步”分析框架,不仅在分析步骤上体现出话语互动研究的理论原则,而且引入“再情景化”等概念性分析工具,既保持分析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又提高分析的学术性和可信性。

### 5.3 “话语互动”与“言语互动”的区别

“言语互动”在互动社会语言学中明白无误地表明,在特定的情景中选择什么语言形式进行交际是一个因人而异、因景而定的偶然事件,同时也暗示出在语言与社会、语言选择和语境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必然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互动社会语言学不仅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实时发生的特定情景中的言语互动”上面,而且将“民族志、民俗方法学、语言学、认知科学、话语、会话分析深度且灵活地融入社会语言学研究之中”(Rampton,2016:307),形成一个与先前注重研究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之间相关性的社会语言学传统相区别的“新的阐释学方向”(di Luzio,2003:3)。然而,互动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言语互动”与“话语互动”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互动社会语言学关注的互动发生在特定社会情景之中,其形式是这些社会情景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会话。对此,维索尔伦(Verschuere,2010/2014:171)列举了互动社会语言学的许多研究案例,包括对法律诉讼、工作面试、医患会话的研究,以及在服务场所、工作场所、教育场所进行的会话研究,还包括对男女之间、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以

及陌生人之间的会话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所观察的社会情景无一例外的都不同于话语互动所涉及的社会语境,而这些研究所分析的语料也都是社会个体之间的会话,不同于话语互动所涉及的依托一定社会机构的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互动。“话语互动”指发生在大的社会语境中的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它所处的社会语境不是一个小的言语交流的情景或场所,参与其中的互动主体也不是会话活动中的个体。因此,对于话语互动的研究不是仅仅关注可以使言语交流成功进行的“情景化提示”(Gumperz, 1982/2009),而是不同社会领域中社会主体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话语互动是社会政治经济网络中发生的互动,其概念内涵和外延都超越了“言语互动”的概念。

其次,“言语互动”在互动社会语言学中的含义相对集中在意义产生的方式上面,一方面表明特定情景中的会话含义产生于会话双方的互动与协商,另一方面表明会话所依赖的情景也通过会话双方意义互动和协商构建出来。正如甘柏兹(Gumperz, 见 Prevignano & di Luzio 2003: 9)自己所讲,“我目前对会话的研究主要目的就是说明诸如音调、语码及语体转换、程式化表达这些指示性符号如何与象征性符号(如语法词汇这些符号)、交谈的次序、文化及其他相关的背景知识实现互动,借此构成社会活动。”可见,“言语互动”不仅体现在参与会话的双方之间,还体现在会话(语言使用)与会话发生的情景(社会语境)之间,而在这两个层面上的“互动”结果则构成社会活动。正如迪鲁兹欧(di Luzio 2003)所指出的,“言语互动”的规则在互动社会语言学中不再被认为是反应独立存在的社会规范,相反,这些规范被认为是通过在交际情景中的互动重新产生出来。然而,通过“言语互动”所构建的“社会活动”在互动社会语言学中还仅是特定情景中的交际活动,这与“话语互动”所关注的社会互动完全不同。话语互动所关注的社会互动通过话语以及话语之间的互动体现出来,发生在社会大的背景之中,参与其中的社会活动者依托于不同的社会机构,并体现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话语互动”的概念在认可互动社会语言学关于会话意义产生于双方的互动以及交际情景也由会话意义构建的同时,也表明其所关注的由话语体现的社会互动发生在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与机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第三,就“言语互动”的后果而言,互动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是会话双方如何通过意义协商与互动将特定情景中的会话顺利进行下去,而“话语互动”所带来的后果远不是这种特定情景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会话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话语互动”对社会活动产生的影响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例如,田海龙(Tian 2020)纵向话语互动的研究表明,处于社会较高层级的话语与较低社会层级的话语之间的互动,其结果不仅是构成了社会活动(社会活动本身就是话语和话语互动),而且是前一个话语对后一个话语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带来实实在在的社会后果。在这方面,“话语互动”有着较“言语互动”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 6. 讨论性结语

“话语互动”与“言语互动”“符号互动”两个概念有所区别,但也不是首次出现在文献之中。例如,沃瑟姆和瑞伊斯(Wortham & Reyes 2015)曾经从跨言语事件的角度讨论过话



语互动问题。他/她们认识到,人类许多活动的过程都不是体现在一个单一的事件上,而是具有跨事件的特征,因此,只对单一事件进行话语分析,不考虑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会使话语分析注意不到言语事件能够引发的重要的变化和影响(Wortham & Reyes, 2015: 17)。在此基础上,他/她们将会话本身称作“言说事件”(narrating event),会话中所谈论的事件称为“被言说事件”(narrated event),而这个包含说者和听者谈论“被言说事件”的“言说事件”则是“话语互动”(discursive interaction)。可见,沃瑟姆和瑞伊斯借用“话语互动”这个术语强调话语分析应该注重对言语事件之间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但是,他/她们所认识的“话语互动”本质上还是建立在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事件”概念上的“言语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尽管这个言语事件是一个社会活动,也可以带来一定的后果,但是,他/她们对跨言语事件的话语分析案例研究显示,其所谈“话语互动”还是停留在对“会话”的分析上面。在这个意义上,沃瑟姆和瑞伊斯提出的“话语互动”概念与我们所探究的“话语互动”有着明显的实质性区别。

作为批评话语研究的新课题,“话语互动”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所探究的话语互动也是一个社会生活网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互动”还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观点。首先,世界上事物或现象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话语互动”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种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它在“话语”体现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凸显社会网络中话语与话语之间的联系。其次,“话语互动”将话语与话语的联系以“互动”的形式体现出来,也表明“相互作用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基本内容和表现”这一唯物辩证法的论述。作为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联系的一种表现形式,相互作用体现为相互联结、相互斗争、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等关系,“话语互动”概念正是体现出话语与话语之间的这些联系。第三,事物之间的联系遵循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彼此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话语互动”的概念体现出话语与话语的联系以“互动”为体现形式,在互动的过程中话语与话语互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双方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但这个统一体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这一统一体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发展变化之中,新的话语也不断涌现。“话语互动”不仅体现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话语之间通过相互作用产生新的话语和新的意义。

世界上的事情是普遍联系的,相互作用的,这在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尤其明显。作为批评话语研究新阶段的新课题,“话语互动”集中体现了批评话语研究对21世纪前20年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互联网技术应用进一步广泛所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探究,以及对这些新问题进行的理论阐释。这种阐释与批评话语分析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同时也从“符号互动”“言语互动”等概念以及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传统汲取养分,在与其有所区别并对其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批评话语研究理论发展的潜势。

## 参考文献:

- [1]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 Coupland, N. & A. Jaworski. 2009.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Part VI [A]. In N. Coupland & A. Jaworski (eds.). *The New Sociolinguistics Reader* [C]. Hampshire: Palgrave.
- [3] di Luzio, A. 2003. Presenting John J. Gumperz [A]. In S. Eerdmans, C. Prevignano & P. Thibault (eds.). *Language and Interaction: Discussions with John J. Gumperz*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4] 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 [5] Fairclough, N. 2009. A Dialectic-relation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C]. London: Sage.
- [6] Fairclough, N. & R. Wodak. 1997/201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H. Tian & P. Zhao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7] Gumperz, J. 1982/2009. Contextualization conventions [A]. In N. Coupland & A. Jaworski (eds.). *The New Sociolinguistics Reader* [C]. Hampshire: Palgrave.
- [8] Hymes, D. 1986/2009.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A]. In N. Coupland & A. Jaworski (eds.). *The New Sociolinguistics Reader* [C]. Hampshire: Palgrave.
- [9] Jones, R. & S. Norris. 2005. Discourse as action/Discourse in action [A]. In S. Norris & R. Jones (eds.). *Discourse in Action: Introducing 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10] Krippendorff, K. 2020. Introduction: Why discourses in action? [A]. In K. Klaus Krippendorff & N. Halabi (eds.). *Discourses in Action: What Language Enables Us to Do*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11] Krzyzanowski, M. & B. Forchtner. 2016.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Facing challenges, moving beyond foundations [J]. *Discourse & Society* (3): 253 - 261.
- [12] Mead, G.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3] Prevignano, C. & A. di Luzio. 2003. A Discussion with John J. Gumperz [A]. In S. Eerdmans, C. Prevignano & P. Thibault (eds.). *Language and Interaction: Discussions with John J. Gumperz*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4] Rampton, B. 2016. Foucault, Gumperz, and governmentality: Interaction,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In N.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 Cambridge: CUP.
- [15] Tian, H. 2020. One case, two verdicts: The vertical interplay of authoritative discourses in China [A]. In K. Krippendorff & N. Halabi (eds.). *Discourses in Action: What Language Enables Us to Do*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16] Verschueren, J. 2010/2014.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A]. In J. Jaspers, J. Ostman & J. Verschueren (eds.). *Society and Language Use* [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17] Wodak, R. 2001/2012.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In H. Tian & P. Zhao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18] Wortham, S. & A. Reyes. 2015. *Discourse Analysis: Beyond the Speech Event*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19] 费尔克劳. 2019. 田海龙译. 《语言与全球化》中文版序言 [J]. 话语研究论丛 (7): 10 - 14.
- [20] 冯玉波 冷明祥. 2014. 试论符号互动论视角下的医患关系 [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125 - 129.
- [21] 田海龙. 2009.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2] 田海龙. 2012. 话语功能性与当代中国新话语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6): 8 - 11.
- [23] 田海龙. 2016. 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 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 [J]. 山东外语教学 (6): 3 - 9.
- [24] 田海龙. 2017. 社会实践网络与再情景化的纵横维度——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课题及解决方案 [J]. 外语教学 (6): 7 - 11.
- [25] 田海龙. 2020. 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话语研究——基于“双层-五步”分析框架的中西医话语互动分析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 128 - 139.
- [26] 田海龙. 2021. 批评话语研究之“话语互动”新路径 [J]. 外语学刊 (2): 16 - 22.
- [27] 祝畹瑾. 2013.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ABSTRACTS

---

### **Intertextual Analysis i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p. 1. *XIN Bin*

The relation each text has to other texts has been called “intertextuality”. The concept of “intertextuality” is significant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at it enables us to analyze and make judgments about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one text in its relation to other texts. However as pointed out by Allen (2000), “intertextuality”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but the most misused terms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vocabulary. In this article we try to explicate the meaning,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concept and some other related concept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tertextual analysis; recontextualization

### **Discursive Interaction: Multi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on the New Agenda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p. 13. *TIAN Hailong*

The development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to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DS) is seen in its new research topics of which “discursive interaction” is one. New social issues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 have replaced the old ones of the CDA’s concern in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becoming the new focus of CDS, thus triggering new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discursive interaction” that invites more theoretical thinking.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discursive interaction” to discuss its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in CDS and its sociological and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traditions, and to delineat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discursive interac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verbal interaction”. In so doing, it highlights that the study of “discursive interaction”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 has shown the potentials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CDS.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new agenda; discursive interac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verbal interaction

### **From Recontextualization to Indexical Order: New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Tool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p. 23. *ZHAO Peng*

“Recontextualization” is considered as a new tool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by van Leeuwen (2008). But when CDA enters its new stage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DS), “indexical order” turns to be a more interpretive conceptual tool.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is newly developed tool in terms of what it is meant, how it is applied, and what significance it ha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doing s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indexical order” are delineated: These two terms have similar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the mediation between language structur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but “indexical order” has more potentials for seeing the inequality between social categories via linguistic analysis. Two points are made in this discussion: 1) the development of CDA is seen in the update of conceptual tools; 2) conceptual tools are essential for case studies in CDS, both in their embodying CDS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applying analytical frameworks and in the specialized accountability they give rise to in specific case studie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ety.

Key Words: recontextualization; indexical orde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and society; discourse

### **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rom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Reception—Revisit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p. 31. *ZHANG Hui*